

# 15—18世纪欧洲人视域下的 土耳其形象<sup>①</sup>

贺敏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土耳其形象因其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自15至17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富于动态,呈现多元化;从18世纪开始,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渐趋僵硬、单一化。其形象的跌宕嬗变既源于欧洲与土耳其之间异若霄壤的宗教及文化的分野,又受二者之间现实政治利益及彼此权力强弱态势的牵制。与此同时,欧洲人对土耳其形象的考量既是奥斯曼帝国盛衰兴废的一种映射,又是欧洲人审视评判“自我”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欧洲人;土耳其形象;奥斯曼帝国;文艺复兴;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K141;K3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7)06-0185-08

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领土中心区域为今土耳其)<sup>②</sup>毗邻欧洲,但二者因大相径庭的宗教、文化而呈现出一贯的颀颀与对峙。尤其从14世纪起,奥斯曼帝国将其征服的步伐从小亚细亚延伸至欧洲,对欧洲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威慑。自此以降,奥斯曼帝国经历了由盛至衰的没落;而欧洲却呈现出从衰到盛的兴起。由此,欧洲如何审视与考量处于权力巅峰与低谷之奥斯曼帝国值得关注。国外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塞缪尔 C. 休关注了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和戏剧作品的近东形象。<sup>[1]</sup>诺曼·丹尼尔和理查德·萨仁认为中世纪早期欧洲人以族裔而非宗教的视角来判别伊斯兰教徒。<sup>[2]</sup>奈比勒·马塔尔追溯了阿拉伯和英国的文学、历史及档案材料以揭示新教英国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态度。<sup>[3]</sup>莱茵霍尔德·希佛则基于160部游记对19世纪的土耳其形象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sup>[4]</sup>阿斯利则长时段地考察了16至18世纪土耳其形象的演变。<sup>[5]</sup>专门

<sup>①</sup> “形象”是行为体(“民族”或者“国家”)的整个认知、情感和评价性的体系,或者是它对自己和世界的一种内在的看法。它会受到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影响,这种关系可用一系列的“相关变量”来描述;战争或和平;敌意或友好的程度;盟友或敌人……请参阅 BOULDING K.E. “National Imag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No. 2, 1959, p.120-131. 及其专著 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1. 在行文中,作者将土耳其形象定位一种可以映射出具有同质性的“想象共同体”。换言之,在欧洲对土耳其集体民族形象的建构和表述中蕴含土耳其帝国的、民族的、宗教的及文化的等多层次的形象概念。

<sup>②</sup>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土耳其人喜欢把自己的帝国称作奥斯曼帝国,但欧洲人喜欢称之为土耳其帝国。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般认为奥斯曼帝国等同于土耳其帝国,本文沿用此用法。

收稿日期:2017-05-10

作者简介:贺敏,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十九世纪英国文献中土耳其形象的百年变迁”(15YJC770012),项目负责人:贺敏;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6CBZ012),项目负责人:贺敏。

研究或者涉猎土耳其形象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sup>①</sup>但是国外相关研究大都没有从纵深历史角度来全方位展示没落的土耳其何以建构出立体而多元的形象,再加之国内学者甚少有此方面的研究,<sup>②</sup>故而,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欧洲视域下土耳其形象嬗变的轨迹,剖析土耳其形象建构的复杂根源,以期较全面地解读土耳其形象的多元性。

## 一、15—17 世纪欧洲人眼中多元化的土耳其形象

在奥斯曼帝国存在的 600 年中,前 300 年是帝国兴盛之征程,而后 300 年则是帝国的没落之途。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不断碰撞,欧洲眼中的土耳其形象因后者权力的沉浮逐渐脱离简单片面的刻板印象,开始变得多元化、复杂化。

宗教的分野使欧洲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冲突与对抗。14 世纪以降,奥斯曼帝国对欧洲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欧洲人沿袭十字军东征时代的反穆斯林宣传,在他们眼中,土耳其人仍然是进犯欧洲的“上帝的敌人”。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欧洲人,特别是对把古罗马当作母体的西欧人来说,是一次无法形容的打击。……然而拜占庭帝国从地面永远消失这一事实,使无法言明的阴影久久占据了人们的心头”<sup>[6]180-1</sup>。人文主义者悲叹失去拜占庭的独立,“基督教世界的两盏灯已被熄掉一盏,希腊的辉煌尽遭毁灭”<sup>[7]141</sup>。5 月 29 日奥斯曼军队成功破城后,连续屠城三天,壮丽的宫殿付之一炬,历代相传的艺术珍品被洗劫一空。<sup>[8]70</sup>据此,土耳其人作为野蛮、残酷“城镇洗劫者”的形象并非空穴来风。面对粗暴的强大对手,欧洲学者竭力站在人文学者的角度同化土耳其人以求某种程度上的和解:首先,在传说中,土耳其人是突厥人的后裔,他们在穆罕默德的率领之下从亚洲一路打拼而来,终于征服了君士坦丁堡,旨在报复希腊人。据编年史家克里特沃伦斯(Kritovoulos)记载,1462 年穆罕默德在去围攻米蒂利尼(Mitilini)岛<sup>③</sup>的途中,在特洛伊宣布他已为突厥人“报仇”。<sup>[9]711</sup>通过把攻陷君士坦丁堡解读为是对希腊人的复仇,土耳其人由此升格为古典人文遗产的继承者。欧洲学者憧憬必将有土耳其人被基督教感化的未来,因为对基督徒而言,世界只是他们被流放的地方,他们相信世界终将属于基督教世界。其次,断言土耳其人是罗马帝国的合法后裔。此说的主要代表是威尼斯的历史学家、国际法研究家弗朗西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他们的起源,并且认真考量他们的内部与外部事务,我们会说罗马人的军队纪律、服从和好运都已经降临此民族”<sup>[10]711</sup>。但是此乃非理性的虚妄之辞,流露出欧洲人难以言明的愤懑。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已使土耳其给人文主义欧洲带来了政治、军事及文化上的灾难。<sup>[11]60</sup>雪上加霜的是奥斯曼帝国并未停止侵入的脚步,反之它在欧洲步步为营,使得更加频繁、更加猛烈的进犯接踵而至。欧洲人对土耳其的“霍布斯疑惧”服膺于中世纪独特的宗教。中世纪时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铁幕的阴影仍然依稀可见。故而,15 世纪欧洲视域下的土耳其形象仍然

① 就笔者所能查阅的范围所及就囊括游记、文学作品、神话故事、回忆录、历史著作、演讲、报刊、硕博学位论文等等。SCHIFFER R. Turkey Romanticized: Images of the Turks in Early 19th Century English Travel Literature, Bochum: Studienverlag Dr. N. Bockmeyer, 1982. DIMMOCK M. New Turkes: Dramatizing Islam and the Ottoma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shgate Pub Limited, 2005. KABBANI R. Europe's Myths of Orient, Macmillan, 1986. PARKER K. Early Modern Tales of Ori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EARS E.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2. Sir ELIOT C. Turkey in Europe, Frank Cass & Co. LTD, 2006. MARRIOTT J. A. R. The Eastern Questi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9. BAILEY F. E. British policy and the Turkish Reform Movement, New York: FERTIG H. 1970. NEWMAN J.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its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1854. 另外,19 世纪英国的主要报刊比如 The Monthly Review, Athenaeum, The Edinburgh Review, The Quarterly Review, Blackwood's Magazine, Daily News, Times 等都曾高密度关注了奥斯曼帝国事务,其中不乏诸多土耳其形象描述。

② 李秉忠,身份与认同——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问题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26-56。文中主要概述了 15—20 世纪欧洲与土耳其的碰撞。

③ 古称莱斯博斯岛(Lesbos Island),即今希腊米蒂利尼岛,位于爱琴海中、土耳其西北部沿岸附近。

保持了宗教桎梏下的形象轮廓。

穆罕默德二世病逝后的继承者巴耶济德二世和塞利姆一世均是出色的征服者，他们戎马一生，东征西战，使帝国的疆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当 1520 年苏莱曼大帝登上王位之时，他继承了历任励精图治的素丹留下的宝贵遗产：所向披靡的军队、日臻完善的封建制度和哈里发桂冠。在他统治的 46 年中，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奥斯曼帝国征伐的硝烟。奥斯曼人利用基督教世界相互残杀的良机，先后于 1521 年和 1522 年攻下向西方领土扩张的重镇贝尔格莱德和圣约翰骑士团盘踞的罗德岛。1529 年及 1532 年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两次兵戎相见于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1538 年奥斯曼军队重创欧洲神圣同盟的舰队，地中海因此几乎成了其海军的内海……奥斯曼帝国在 16 世纪处于兴盛的黄金时代。但 1566 年接任苏莱曼大帝的是“酒鬼塞利姆”，学界普遍将此划定为帝国衰落的开端。欧洲人以苏莱曼大帝的尊号将其载入史册，苏莱曼大帝自诩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众素丹之素丹”，臣民尊称其为“立法者”。面对骁勇善战的奥斯曼军队，土耳其的负面形象继续萦绕欧洲人心头，充满敌意的恐惧在牧师的布道中可见一斑。1565 年，索尔兹伯里主教在周三、周五的祷告中祈求上帝的同情怜悯之心，祷告万勿将他们置于异教徒土耳其人之手，“万能永恒的主啊，我们的天父，我们是您不孝叛逆的子孙……我们深陷危险之中，受到您和我们诅咒的最可怕的敌人，土耳其人、异教徒、恶棍的压迫……”<sup>[12]1</sup> 在某种意义上，土耳其人似乎就是泥足怪兽，只要想想这个怪兽就足以使欧洲人心惊胆战。

然而，综观关于土耳其形象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欧洲人对土耳其所持的是一种“充满爱恨情仇”般复杂多元化的态度，敌意与羡慕、恐惧与好奇、鄙视与嫉妒并行不悖。处于上升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因其威慑力成了“欧洲的恐慌”，土耳其人是“唯一的现代民族，行动成功，其帝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略了世界”<sup>[13]2</sup>。在奥斯曼帝国处于权力上升时期，欧洲的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对其强大的国力和军队力量充满了“羡慕妒忌”之意，它们欲借助奥斯曼人的帮助，旨在完成其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但与此同时也裹挟着既有的对土耳其人的定势考量。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巅峰恰与欧洲的宗教改革巧合，新教国家把奥斯曼帝国的进攻解读为上帝对邪恶天主教的惩罚：“天知道，土耳其人是上帝的御用工具，用之于摧毁主教，而后上帝折磨其，用它的怒火消灭其。”<sup>[12]5</sup> 新教的拥护者普遍期望土耳其人能与天主教徒相互厮杀，这样新教徒只作壁上观，坐收渔翁之利。但就算作为宗教斗争的走卒也未能消解欧洲人附加给土耳其人的负面评价，马丁·路德在《对于反土耳其祈祷的劝诫》里就警告要对土耳其人提高警惕。<sup>[14]5</sup> 其二，迫于国内危机，伊丽莎白一世积极与奥斯曼帝国修好以应对西班牙的挑战。她率先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第一个大使馆，并且直接与奥斯曼皇宫保持了良好的交往关系。<sup>[12]27-61</sup> 两国之间的商业和战略联盟有效地破坏了西班牙的力量，二者之间的政治和商业联系增加了对伊斯兰表述的复杂性。但危机一结束，女王就下定决心打造自己为欧洲“共同事业”领导者的形象。她致函鲁道夫二世，称土耳其人是最讨厌的敌人，并且希望基督教世界的君主求同存异，联合抵制异教徒。<sup>[15]35</sup> 其三，法兰西斯一世时，法国取代米兰和威尼斯成为与土耳其打交道最多的欧洲国家。法国与奥斯曼帝国交好的主要意图在于政治上利用土耳其来遏制哈布斯堡王朝，但是此举并未得到基督教世界的理解，后者视之为背叛行径。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被迫强调法国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圣地和拉丁基督徒；其次是贸易；政治目标只能退而求其次，被置于目标清单的最末位。<sup>[7]143</sup>

总而言之，15 至 17 世纪欧洲人对土耳其形象的考量一方面是负面的，与中世纪的审视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又是正面的，迫于奥斯曼帝国形成的压力，欧洲人在抨击之余也带着“自卑而嫉妒”的感情，使得土耳其形象出现了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倾向。从 15 至 17 世纪欧洲人创造了动态的土耳其形象：首先他们是野蛮的、道德败坏的、血腥的异教徒；但与此同时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充满了敬仰之情。在政府层面，帝国的能人统治尤为得到赞赏；所有人的尊严都来自于他们个人的美德和勇敢；没有人由于出身而与众不同；荣誉与人们所履行的义务和职责相关<sup>[16]29</sup>。其它令欧洲人仰慕的

优点还包括:宽容的政府、简单高效廉洁的司法体制、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民族层面,土耳其人拥有诸多令人愉悦的特点:耐力、节约、冷静、干净、礼貌、好客。<sup>[7]149</sup>在帝国强盛时期,许多基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或者是由于他们卑贱的社会地位迫使他们这样做,或者是他们希望能够成为强大帝国的一分子。<sup>[3]15</sup>维也纳间谍曾亲眼目睹了奥斯曼军队备战的过程,他不无讥讽地说:“如果长此以往,最终我们都会成为‘土耳其人’”。作为土耳其万民之尊的素丹更是因为帝国之繁荣强盛赢得了无上的赞誉:德皇怎敢与土耳其素丹相比较呢?谁敢说比素丹拥有更绝对的权力?全世界唯一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就是奥斯曼素丹。只有他才能配得上称作是罗马皇帝的后裔。<sup>[9]712</sup>帝国蒸蒸日上之势由此可见一斑。

## 二、18 世纪欧洲人眼中单一化的土耳其形象

有学者指出,我们之所以把奥斯曼帝国叫做“帝国”,因为我们用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丰功伟绩来考量它的成就,然后发现它们经历了相似的兴衰轨道。<sup>[17]99</sup>1571 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陀(Lepanto)被击败,结束了土耳其人不可战胜的神话;1683 年维也纳之围失败,从此奥斯曼帝国对欧洲不再构成威胁;1699 年签订的《卡洛维茨条约》标志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已落下帷幕,帝国疆域已经开始缩水;1774 年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迫使土耳其给予俄国黑海的出海口,“东方问题”由此开始。……事实上,到 16 世纪末许多外国驻伊斯坦布尔具有观察力的大使,以及一些机敏的帝国有识之士都已经看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西方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使他们变得相对强大了。<sup>[8]80</sup>换言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欧洲之间强弱态势出现了大逆转。15 至 17 世纪欧洲人对土耳其的审视是基于弱者对强者的仰视,但是现在权力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了欧洲人的手中,他们对土耳其的审视是基于强者对弱者的俯视。如果说 15 至 17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强盛激起欧洲人的自卑感的话,那么 18 世纪的欧洲人终于如愿等到“复仇”的时机,他们对土耳其人充满了鄙视之情。土耳其人既不可怕也不受尊重,在欧洲人眼中,他们是乏味、落后的民族。如果把更“原始”、更“简单”,或者帝国治下的被压迫民族与土耳其人做对比的话,阿拉伯人、鞑靼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以及土耳其的其它少数民族都比土耳其人拥有更好的品德。鞑靼人和阿拉伯人或是高贵的野蛮人或是古老光辉文明拥有者埃及人、叙利亚人、希腊人的后裔;而土耳其人只是生活在腐败专制的社会。<sup>[5]108-9</sup>

18 世纪,奥斯曼帝国彻底褪去了帝国之光辉,陷于壅滞状态。世纪早期见证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郁金香时代”,土耳其人开始对文化、科学技术、艺术表现出兴趣,但与此同时,帝国的上层却耽于享乐,腐败、酗酒蔚然成风,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苛责与日俱增,15 至 17 世纪复杂多元化的土耳其形象也因此变得单一化。土耳其被贴上了落后、停滞、腐败、专制的标签。事实上,在比较视野之下,欧洲是启蒙和自由的化身,而后者却集无知、专制、静止和落后于一身。<sup>[5]109</sup>在欧洲的启蒙理性时代,启蒙思想家反对因无知、迷信及偏狭造成的偏见,但他们在考量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形象时却表现出非启蒙视角。他们倾向于摒弃理性,赞成原始的愤怒,对土耳其人的审视可谓极尽“众口铄金”之意,土耳其形象的考量落入了“专制”理论的窠臼。换言之,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立足于观察或者经验来审视土耳其形象,相反他们倾向于建构单一、定势的土耳其形象。土耳其被看作是东方最不可救药、最令人讨厌的民族。<sup>[5]106</sup>

这一形象的界定主要受 18 世纪甚嚣尘上的东方专制思想的影响。东方专制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亚细亚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惟独位于此二者之间的希腊各种姓兼有两者的品质。他们热忱、理智、精神健旺,所以永保自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它民族。”<sup>[18]360-1</sup>但是彼时的欧罗巴和亚细亚并非现时的“西方”与“东方”。直到十字军东征,西欧学者具备了较多的地理知识才开始讨论有关“东方”与“专制”

的概念。<sup>[19]40</sup>近代欧洲“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是法国学者孟德斯鸠。他的《论法的精神》根据大量旅行家的记述、讨论东方专制,将其概括为“亚洲的奴役”与“欧洲的自由”<sup>[20]275</sup>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孟德斯鸠根据旅行家的游记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游记家们却借助孟德斯鸠的理论来分析亚洲的奴役。换言之,旅行家们带着既定的专制印象去旅行,他们根据一些与历史无关的标准,比如说人性、气候以及宗教来考量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18世纪西方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报道昭示后者军队衰落、政治腐败、臣民无知和游手好闲,这一切均归咎于政府的“准则”。<sup>[5]11</sup>这种准则实际上就是君主的绝对权力、对其臣民的压迫及后者的无条件顺从。

在奥斯曼帝国众多游览者之中不乏孟德斯鸠的追随者。弗朗西斯(Francis Baron De Tott)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在伊斯坦布尔居住了25年,对他而言,专制是土耳其人的心理特征,与气候和信仰息息相关。土耳其形象在奢侈、自负和野蛮之间游荡。野蛮使得奥斯曼统治者变得专制,而其臣民的奴性和盲目顺从则植根于他们对宿命论的信奉。<sup>[21]61</sup>除去把专制归咎于气候和宗教外,欧洲学者还认为在奥斯曼帝国没有贵族、私有财产的存在,故而导致专制的肆虐。<sup>①</sup>关于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叙述似乎也能印证专制渗透于社会的各级阶层,奥斯曼官员们逐级压制、奴役下一级人民,就算操生死大权的素丹也不得不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近卫军的摆布。走马观花式大维齐的轮番更换总与素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般恣意“铲除异己”的专制脱不了干系。

简而言之,孟德斯鸠的气候决定论和东方专制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但却在18世纪引发了欧洲学界的极大关注。众多孟德斯鸠的追随者和他一起把奥斯曼帝国作为样板来阐述东方专制。18世纪的土耳其人被刻画为具有被动、胆怯的特点。他们对上级恭顺,但对下级野蛮专制。<sup>[21]62</sup>他们以静止的眼光考量土耳其形象,因为在18世纪不管奥斯曼帝国愿不愿意,它都被动地被卷入了欧洲政治,它曾经在历史上对欧洲造成的威胁不复存在,被动沉浮于权力漩涡的奥斯曼帝国只是展示“后起之秀”欧洲优越性的配角,欧洲的学者竭力展示它的不足和失败,彰显欧洲人的优点和成功。我们认为18世纪欧洲人之所以对土耳其持有妖魔般的虚幻印象主要是隐藏着的傲慢、复仇、怨恨的情绪使然,面对举步维艰、行将就木的奥斯曼帝国,欧洲人曾经相形见绌的自卑感踪影全无。反之,欧洲的学者和旅行家们以最犀利的目光洞穿帝国的没落,企图建构歪曲、偏颇的形象对土耳其进行“盖棺定论”。然而在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封闭专制的形象不断被打破,但又不被不断被巩固、深化。

### 三、多元化土耳其形象的根源

如上所述,土耳其形象的建构经历了从简单的一元、二元化到复杂化的过程。为什么在15至17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是富于动态、多元化而在18世纪却是静止、单一化的呢?其中之根源既有现实的考虑,也夹杂历史的因素。

首先,宗教的分野造成了欧洲与土耳其一以贯之的颀颀与对峙。欧洲最初站在族裔的角度对伊斯兰进行了解读,强调其野蛮性。但在“无知时代”就开始借助《圣经》的注释来建构异端穆斯林的形象。萨拉森人的祖先或是撒拉(Sarah)的儿子;或是夏甲(Hagar);<sup>②</sup>或是没有领到俸禄的乌合之士兵,他们的头目穆罕默德建立了新的宗教,旨在发动军事侵略和扩张。<sup>[12]16</sup>在基督教徒看来,伊斯兰教如同吞噬世界和平与安宁的毒瘤,基督教仗其在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上的支配地位不惜以

---

<sup>①</sup> 马基雅维利、让·不丹和培根都强调贵族的缺席是奥斯曼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认为贵族可以有效遏制统治者的专制本能。但是伏尔泰并不认可此观点,他认为奥斯曼帝国是民主的,它与欧洲文明的差异在于各自对待妇女的方式有所差别。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庞特尔(Porter)坚持认为奥斯曼帝国有关私有财产的法律。更多的争论可参见于YAPP M. E. “Europe in the Turkish Mirror”以及? IRAKAMAN A. From the “Terror of the World” to the “Sick Man of Europe”: European Images of Ottoman Empire and Society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Nineteenth.

<sup>②</sup> 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以撒的母亲;夏甲是亚伯拉罕之妾,亚伯拉罕之妾撒拉出于嫉妒将其驱入沙漠。

子虚乌有的卑微出身来肆意攻击与它相对峙的“异教”。十字军东征时,乌尔班二世号召全世界的基督徒联合起来与“上帝的敌人”决一死战。在新教辩论中,土耳其人被称为“上帝之鞭”,它与教皇被喻为“敌基督”的两个首脑。但在奥斯曼帝国声名显赫之时,欧洲国家热切期待借助土耳其人的威力来抵制哈布斯堡王朝,然而基督教世界表达更多的是土耳其人威胁他们,掠夺他们的财富,是他们“天然的敌人”,他们寄希望于让“怪兽的两根肋骨相互争斗,让真正的教会得以强大起来。”<sup>[16]30-9</sup>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及其追随者无情鞭笞伊斯兰教,多方面地揭露伊斯兰文化龌龊、蒙昧和欺诈的一面。据此历史痕迹,基督教欧洲对伊斯兰土耳其的排斥昭然若揭。

诚然,宗教信仰在18世纪之前在很多国际纠纷之中扮演了“幕后推手”之火上加油的角色,但在影响国家的现实决策时,宗教热情往往受到冷遇,现实政治利益是首要的考虑。“任何国家都未能出于信仰理念的考虑而限制了自己的结盟,异教的土耳其甚至在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前就已是西方均势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sup>[22]34</sup>从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看,法国与英国所结成的“臭名昭著”的同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土耳其在欧洲权力博弈的舞台之上只不过是一颗棋子而已,它与结盟的一方达成暂时性的妥协。一旦等到欧洲实现了企图,它看待土耳其的眼光仍然是定势僵化的。因此,“无论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纽带。”<sup>[23]34</sup>

其次,在文化方面,欧洲承袭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科学及民族传统等。在现实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他们崇尚文明、自由、进步,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欧洲特性。但土耳其特性的核心是穆斯林特性,顺从被视作是它的核心因素,而盲目顺从孕育了专制所必需的奴性精神。<sup>[5]130</sup>虽然奥斯曼帝国横跨亚欧两洲,但在欧洲人心中,它乃一亚洲民族,具有专制、野蛮和邪恶的特征,在帝国积弱积贫之时又平添了落后、保守、壅滞等特点。两种异若霄壤的文明在彼此频繁的碰撞之中帮助界定了彼此,这种方式的考量在历史上古已有之:华夏民族曾经把黄河流域以外的民族一律斥之为“蛮夷”;希腊人认为亚欧只是地理上的区分,与文化无关,唯一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希腊人(讲希腊语的那些人)与非希腊人或野蛮人。<sup>[7]136</sup>穆斯林把世界分为穆斯林统治区和非穆斯林统治区。<sup>[7]139</sup>在这种“非黑即白”的考量中,“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敌意得以彰显。实际上在早期,每个民族都视其疆域外的土地为化外之地,人民为化外之民。对于奥斯曼穆斯林来说,欧洲就是法兰西基督徒的土地,它就是“战争世界”(Dār al-Harb)。这是邪恶之人居住之地,如果不是因为诅咒,他们从来不被提及。<sup>[7]140</sup>对于欧洲而言,在所有能界定它的“他者”中,离其最近、最明显、最具威胁意义的则是伊斯兰近东。<sup>[7]136</sup>土耳其人因此成了欧洲人审视自我的一面镜子,他们具有欧洲人不具备的一切缺陷,成了评判考量自我的参照物。伊斯兰/土耳其在宗教和文化上给欧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种“奥斯曼的威胁”一直潜伏至17世纪末,而到了18世纪,步履蹒跚的土耳其成了遭蔑视、鄙视的蛮夷之族。欧洲学者在表述土耳其时,竭力刻画它的原始、落后、扭曲、偏狭的形象,由此欧洲睥睨群论,不可动摇的文化优越感扑面而来。

再次,复杂多元化土耳其形象话语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博弈。仔细梳理15至18世纪土耳其形象的研究就会发现土耳其似乎无法表述自己,土耳其习惯于生活在欧洲国家所建构的话语体系之中。原因有二:其一,从启蒙时代起,土耳其学者对书写此类历史不感兴趣;其二,土耳其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极力推行世俗化变革,有意忽略奥斯曼帝国因素。在15至17世纪,强盛的奥斯曼帝国拥有强大高效的中央集权,它的军队威力、能人统治、宗教宽容等得到了欧洲的敬仰与赞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野蛮、可怕的土耳其人形象的一种中和。但到18世纪时,欧洲与奥斯曼帝国的强弱态势出现了颠倒,奥斯曼帝国已不再是“欧洲的恐慌”,其国力日殆,命运捆在欧洲的绳索之上,沦落为“欧洲病夫”。欧洲人考量土耳其的视角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曾经对奥斯曼帝国的“羡慕妒忌”之意已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资本主义文明、工业文明及基督教文明之代表的眼光来俯视尚处于封建时代的前工业文明及伊斯兰文明之代表。借用约瑟夫·张伯伦的话来说,昔日显赫一时的奥斯曼帝国成了“疲倦的泰坦,在它巨大的命运轨道上(摇晃)。”<sup>[24]238</sup>面对“欧洲的奇

迹”，骨子里羸弱的奥斯曼帝国难以望其项背，此时的土耳其恐怕就是索尔兹伯里勋爵眼中“奄奄一息”的大国，它的命运操在“生气勃勃”的欧洲人手掌之中。<sup>[24]202</sup> 据此，多元化土耳其形象的建构与欧洲和奥斯曼帝国权力的强弱变化如影相随，在后者权力式微之际，“天朝上国”观念开始破灭，昭示“强权即公理”的逻辑，颇带几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色彩。

实质上，从15至18世纪欧洲人视域下跌宕起伏的土耳其形象的表述囿于西方的叙事框架，蕴含对劣等的东方“他者”的隐性表达。具体的政治、经济、外交的现实语境再加之历史、文化和宗教的承袭使得东方缺席于对其形象话语的建构过程，因而裹挟了“东方学”的因素。尽管奥斯曼帝国建立的基地是拜占庭的核心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但是在西方看来它并不属于西方世界。16世纪起，东西方之间巨大的鸿沟已经渐露雏形。地理学家彼得·泰勒认为“科学的逐步发展最终确定了欧洲对世界的支配，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文明……正是作为‘西方’或者‘现代’文明的欧洲在枪支的数量以及生产方面超越了所有的参与者……现代欧洲以不言而喻的优越性而至巅峰。”<sup>[25]1917-28</sup> 故而，西方被贴以“欧洲”“文明”“自由”“进步”标签。毋庸置疑，在文明、自由、进步的西方叙事框架下，土耳其帝国在“文明的进程”中落伍，成为了“不变的东方”的典型代表，与“启蒙”、“进步”的鲜活标本——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映射出东西方在财富和权力攫取方面的不平等。西方借此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视角来审视东方/土耳其，造成对其形象话语表述的支配，于是“穆斯林”“野蛮”“落后”“专制”的土耳其形象得以延续，蕴藏深刻的政治、文化影响，为18世纪末肇始的东方/土耳其追求欧化、现代化改革造足了舆论声势。

#### 四、结 语

自19世纪30年代以降，欧洲学者给予土耳其形象研究以很大的兴趣，虽研究路径因人而异，但所建构的土耳其形象逐渐脱开单纯片面的刻板印象，出现复杂化、多元化的趋势。15至17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拥有诸多美德，但也裹挟定势的成见：土耳其虽背负“世界恐慌”的罪名，但却是“唯一的现代政府”；18世纪时欧洲对土耳其形象的建构趋于单一化：奥斯曼帝国成为东方停滞、专制的代表。隐藏在土耳其形象的历史嬗变背后的是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大相径庭的宗教、文化因素，与此同时，彼此权力的强弱态势奠定了形象话语的基调。从15至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嬗变的轨迹来看，形象的建构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弹性，它可能是荒谬的幻觉，也可能是应付复杂世界的一种简单“处方”。由于形象的建构受到了宗教、文化及权力的羁绊，所以很难有不偏不倚的客观公正的民族形象，它随上述因素跌宕起伏，却也能道出国家的盛衰兴废、命运沉浮，“政治现实主义建立在对人性的多元理解上。现实的人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宗教人’等多种人的综合体。……人心必然对政治的真相加以伪装、委曲、贬抑、粉饰。”<sup>[22]40</sup> 一言以蔽之，当奥斯曼帝国成功时，欧洲人所建构的土耳其形象中蕴含获得认可的因素；当它衰落时，欧洲人藐视它、拒绝它，其中的荣耀屈辱恐只有身临其境的土耳其才能味其甘苦。

#### 参考文献：

- [1] CHEW S.C. The crescent and the rose: Islam and England during the renaissanc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 [2] DANIEL N. Islam and the west: the making of an image[M]. Oneworld Publications Limited, 1960.
- [3] MATAR N. Islam in Britain(1558—1685)[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4] SCHIFFER R. Oriental panorama: British travelers in 19th century Turkey[M]. Amsterdam & Atlanta: GA: Rodopi, 1999.
- [5] ÇIRAKAMAN A. From the terror of the world to the Sick man of Europe: European images of ottoman empire and society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nineteenth[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2.
- [6] 堀野七生,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M]. 杨征美, 译. 台北: 三民书局, 2006.
- [7] YAPP M. E. Europe in the Turkish mirror[J]. Past and Present, 1992, 137: 134-155.
- [8] 黄维民. 土耳其卷[M]//彭树智, 中东国家通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9] DERINGIL S. The Turks and Europe: The argument from history[J]. Middle East Studies, 2007, 43(5): 709-723.

- [10] YERASIMOS S. Türkler romalilarin mirascisi midir? (Are the Turks the Heirs of the Romans?)[C]. Toplumsal Tarih, 2003, no.116.//In DERINGIL S. The Turks and Europe: The argument from history. 709-723.
- [11] IRWIN R. For Lust of Knowing: The orientalist and their enemies[M]. London: Allen Lane, 2006.
- [12] MACLEAN G. Looking east: English writing and the Ottoman Empire before 1800[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13] BLOUNT H. A voyage into the levant[M]. London: John Leggatt for Andrew Crooke, 1636.
- [14] 伯纳德·刘易斯. 中东[M]. 郑之书,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
- [15] BAUMER F. L. England, the Turk, and the common corps of christendom[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s, 1944, 50(1): 26-48.
- [16] 李秉忠,身份与认同——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问题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2008.
- [17] MACLEAN G. When west looks east: some recent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muslim Cultures[J]. 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 2007,7(1):96-112.
- [1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9] 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J]. 史学理论研究,1993(3):36-55.
- [20]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21] ÇIRAKAMAN A. From tyranny to despotism: the enlightenment's unenlightened image of the Tur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y, 2001,33(1):49-68.
- [22] 马丁·怀特. 权力政治[M]. 宋爱群,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 [23]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 徐昕,郝望,李保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4]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 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25] TAYLOR P. J. Embedded stat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opening up to new spa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8, 1996 (11):1917-28.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